



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Shizhuan Chuantong yu
Zhongguo Dangdai Changpian Xiaoshuo

毕文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



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Shizhuan Chuantong yu
Zhongguo Dangdai Changpian Xiaoshuo



毕文君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 / 毕文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 - 7 - 5161 - 4848 - 8

I. ①史… II. ①毕… III. ①史传文学 - 影响 - 长篇小说 - 小说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07. 4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2601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曲弘梅

特约编辑 薛敏珠

责任校对 王斐

责任印制 戴莹



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295 千字

定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史传传统与当代传承

——毕文君《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序

孟繁华

毕文君的《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她毕业后到大学任教，一边教学一边从事专业研究。后来她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这部著作就是她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修改完成的。“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是一个真问题。它的两个关键词：史传传统和中国当代长篇小说，都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有不能分割的内部关系。或者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某种形态，如果离开了史传传统，从叙事学的意义上是不能解释的，特别是“十七年时期”的长篇小说。因此，毕文君选择这个题目，显示了她良好的专业训练和学术眼光。

新时期以来，较早系统论述这个问题的是陈平原先生。他1987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出版后好评如潮。被认为是“以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为根基……借鉴托多洛夫的叙事理论……从叙事时间、叙事角度、叙事结构三个方面‘把纯形式的叙事学研究 with 注意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开大陆学者应用叙事理论以成专著之先河”^①。其学术价值可见一斑。但是，陈平原先生研究的是“中国文学传统和晚清、五四的小说状况”，由于专业的原因，他不可能涉及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模式或类型。因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第2版，第293—308页。

此，就论文的研究范畴而言，毕文君的论文具有“接着说”的、发展性研究的性质。至于“说”得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史传传统自先秦以降，是中国人文学科最重要的叙事模式。《左传》《史记》《汉书》等莫不如此。因此也才有了中国人文学科独特的“文史哲不分”一说。刘勰的《文心雕龙》专门有“史传”篇。刘勰对历史著作主张“务信弃奇”，他强调“实录无隐”、“按实而书”、“贵信史”等，对不可靠的东西，他认为宁可从略甚至暂缺不写，而不应穿凿附会，追求奇异；他特别反对的是不从实际出发。但刘勰并没有贯彻自己的观点，他反对为女后立纪，还提出“尊贤隐讳”的主张，这和他强调的“实录无隐”有所抵牾。事实上，任何历史著作都难以做到“实录无隐”。比如中国历史著作的开山之作《左传》，这是一部酷似于《伊利亚特》式的著作：如果你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作为中国史学叙事的开山之作，它的深刻影响显然不止于《史记》和《资治通鉴》。特别是它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在文学领域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三国演义》：我们宁愿相信《三国演义》就是“三国”的“历史”，它的重大影响远在《三国志》之上。一部文学作品于历史来说甚至超过了历史著作，起码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曾有另一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它空前绝后。至于晚清小说史传之风日盛，与陈平原先生这一看法确有关系：“这一代人有幸身逢历史巨变，甲午中日战争、戊戌维新变法、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以至袁世凯复辟，一次次激烈的社会动荡，明白无误地提醒他们正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于是，在抚千载于一瞬感慨兴亡之余，作家们纷纷执笔为大时代留下一很可能转瞬即逝的历史面影。如果说杜甫以下的历代诗人更多借‘诗史’表达他们面临民族危机时的历史意识和兴亡感，晚清作家则更借重小说形式，详细描绘这一场场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变——尽管往往只能侧面对着墨。”^①

另外，文学史传传统的形成，既与中国历史学相对发达有关，同时

^① 陈平原：《“史传”、“诗骚”传统与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新小说”到“现代小说”》，《文学评论》1988年1期。

也与小说这一样式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关。过去的小说是四部不列，士人不齿。其地位的改变源于现代小说观念的提出。这一点，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大概最有代表性。小说地位的提高及其再阐释，背后隐含了当时知识分子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强烈而激进的渴望。于是，小说成了开启民众最得心应手的工具，小说带着通俗易懂的故事传播了小说家希望表达的思想。这一现代小说传统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得以延续，并成为当时思想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当代小说“史诗”创作，一方面来自西方自黑格尔以来建构的历史哲学，它为“史诗”的创作提供了哲学依据；一方面就是本土文学的“史传传统”，它为“史诗”的写作提供了基本范型。于是，史诗便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段甚至成为评价文艺的一个尺度，也是评价革命文学的尺度和最高追求。毕文君的论文发现了中国当代小说重要的内在结构，并在这一范畴形成了她系统的看法。她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入手，认为：“文学传统应如何面对历史与当下，这样的疑问与反思随着当代文学研究经典化问题的讨论日益显豁，已成为当代文学研究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而从文学传统当代重建的可能性入手，进而寻觅学术研究史的知识谱系与问题结构，这不仅构成了中西研究的差异下对文学传统历史化问题的不同表述，也暗含了文学传统的当代性如何作为悖论与‘幽灵’这种不确定状态的存在境况。文学传统的存在方式恰又因其文学性显得更为生机勃勃，在易代之际，转折时期的潜行与流逸则使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与历史意义命题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格外趣意横生。”^① 无论如何，“当代”都是一个易代之际，是一转折时期。这一点，在“十七年文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当然，本书的重点是“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因此毕文君主要论述的还是史传传统与当代长篇小说传承关系的话题。我认为，无论从理论概括上还是从具体作家作品的分析上，毕文君能够提出自己的见解，成一家之言。这也就达到了这篇论文的预期目标；当然，没有欠缺的论文是不存在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篇论文如果能够再涉及新世纪以后，特别是当“总体性”崩溃以后中国长篇小说的状况，论文会更有意思。因为那同样也会涉及“史

^① 见本书《上编 史传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

传传统”的命运。当然，这应该是另一篇论文的内容了。

毕文君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带的博士研究生。她对专业的热爱、学习的刻苦和朴实的为人，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她这部经过多年修改的论文即将出版的时候，我说了上面一些话。

权当序言。

2014年4月20日于北京

前 言

一 选题目的与研究思路

选择“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进行关联研究主要有三点原因。

其一，是对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问题的关注。在当代文学领域，随着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确立越来越被重视。而就长篇小说研究而言，经典化的确立更为独特，因为我们很难找到一个相对清晰并且完整的线索来描述确立及建构当代长篇小说经典化过程的发展轨迹。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是由长篇小说这个文体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独立、自由和创造性特质规定的。而细细考察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发展脉络可见，与现代文学中对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确立不同，当代文学中长篇小说经典化的确立有着同时面对历史和更要面对现实的复杂特性，是一个文学和历史同步建构、共同影响的过程；更是不同的作家，以长篇小说这种形式来表现复杂的历史内容，以此表达他们各自不同的审美思想的文学整合。而在这个建构、整合的过程里，常常被忽视的一面就是：当代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发展的文学资源与其文学传统的来源、结构、内涵等。因而，在寻觅经典化的过程中，细细辨析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源与流，思考其文学传统的流转，是选择这个题目的初衷。

其二，更为直观的原因是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文学创作现象，这就是许多活跃在长篇小说创作前沿的作家，他们的创作都

在发生着一些值得思考和研究的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他们对某种文学传统的靠近以及他们在创作中对这一传统的改写和转化。这种靠近、改写、转化，可以表现为几个层次：一是暗合，二是偏离，三是变异。如格非、莫言、余华、王安忆等，他们的长篇小说创作都在晚近呈现出这样的状态。所以基于这样的创作现实，对“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与文学传统之间所存在的深层关系”这一命题，进行文体要素、历史联系、精神内涵等方面的拓展研究就显得更为实际和突出。毕竟，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已经存在的文学事实和创作现象。

同时，在中国小说的庞大体系里，“史传”——作为文学传统的存在，对长篇小说这个文体发展的影响是极为重要的。“史传传统”——作为当代长篇小说发展的文学资源而存在，这个论题是可以成立的。这也是笔者选择这个题目最为切实的思考。具体就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发展的不同时期：“十七年时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其经典化、代表性的长篇小说作品所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及这一传统在作品中的表现形态都有不同之处。当然，更有互相关联的地方。可以说正是作家们对传统与现实的不断介入共同构成了当代长篇小说对历史、时代、现实的持续写作，并且借由这些书写，作家不断地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形式发展中添加一些新鲜的要素。比如，不同形式的文体在作品里呈现出的跨越、分裂样态；又如，对真实与虚构限度的区分，这两者的分别似乎很难在一部作品里截然不同地表现出来；再如，历史与个人记忆的微妙关系，它们在长篇小说这一文体发展中所呈现的或紧张或弥合、或互为印证或互相补充的种种形态……类似的要素还有很多。它们的存在不仅给作品流露出的历史感提供了更为深层的本体支撑，而且使研究对象更为形态各异，也就很难以简单的方式去做一个类型化的区分。于是在研究的层面必然决定了该命题本身就存在着不断追问、深入探讨的空间，以及在此基础上细致分析、绵密思辨的可能。更何况，对于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写作传统的文化脉络来说，当代长篇小说发展中所浸润的历史话语显现出的史传特质是中国小说以其自身来书写历史的深层表现形态，而经由诸多作品所呈现出的复杂历史意识与多样化的审美表达，无疑是当代长篇小说在其文体发展过程中最为明显的美学特征与诗性意味。

在此还要提出的一点问题是，笔者研读过一些西方的小说理论，觉得很多东西并不是非常贴合阅读小说作品时的感受，当然，这里并不是否定和解构这些小说理论，笔者在本书里也有多处引用和分析，毕竟这是无法回避的优秀思想和智慧。但是，笔者想要表达的是：对这些理论思想应该在怎样的背景下引用？这种借用是否能与自己的想法相互碰撞、产生共鸣？在此过程里对小说本体理论的研究和辨析可不可以真正将小说作品的感人、深刻、博大、美好显现其中？在笔者看来，以上这些疑问都是为了小说本身而存在的。恰是由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样式本身在当代文学中所表现的非凡气势，对它的分析研究和理论建构也隐藏着一种顿挫盘郁、无法穷尽之感。它的宏伟却细腻，它的酣畅而淋漓，都是被其研究对象所内在规定了的。这样的规定，一方面奠定了研究者的研究主体性；另一方面，也对他们的研究主体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更为实际的挑战。

由此，再联想到本书的研究论题，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小说的史传传统方面，当代小说对它进行着不断的延续和发展，而其中的变异、文人对历史的小说虚构与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历史事件在小说文本里的处理方式等，这些值得深入思索和探求的问题其实并未得到有效的系统研究，尤其是对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还不多见。因此，在尝试以上研究的同时，又着力牵扯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历史意识等问题。值得欣慰的是，目前的当代长篇小说已经在诸多方面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文本形态，而这些更为切实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用西方小说理论就可以涵盖的。扩而大之，在阅读中国古典小说理论与古代小说评点的过程中，启发而下，真正吸引笔者的是理论框架与阐释小说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这种距离的存在难道仅仅是因为理论不能完全概括文本所能解释的吗？如果说当代文学自确立之时，其中的小说批评就是一个吸纳了很多文学和非文学因素的机体，比如十七年时期、“文化大革命”、80年代，而90年代以来又有形式上和理论上的变革，那么，对古典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的承接却似乎还不够。从这一点出发，在自己的研究中不仅考察当代长篇小说在发展过程里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延续）和转化，而且试图在古代小说理论和小说批评如何为今世所化、如何为今人所用方面作一些探寻。

全书的写作思路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问题描述与“史传”文献梳理，第二部分是基于中国古代小说传统视域下历史线索的呈现与基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递进所形成的衍生性话语谱系的描述，这两部分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本书上编“史传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和中编“史统散而小说兴：‘史传三调’与现代长篇小说话语发端”中；第三部分是影响中的当代变异、文本裂隙与传统重构中资源对话的问题语境与难度的梳理及反思，这一部分是本书的主体内容，主要集中在下编“史传精神与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中。具体而言，在如上研究思路的整合与提炼中本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可做如下延伸与辐射。

首先是对“史传传统”的梳理和把握。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整个研究的思路和论证结构。如果仅仅是在既有文献下进行梳理是不够的，所以在研究框架的设计中试图将“史传传统”作出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此呈现它在中国小说的整体脉络中所产生的不同流向。这也是笔者在上编第一章“文章分类学意义下的史传及其传统”里试图解决的问题。但是区分的界限问题具体把握起来是相对困难的。尽管文中试图区分事件、经历、虚构三方面史传传统的不同流向，但往往在具体的小说中三者是互相融合的。对此，笔者在该部分第二章“史传的内在背离性”里有所论述。因而如何能将区分的有效性和概括性体现在研究中是遇到的问题之一。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取如下思路，即在区分的同时注意不同流向的共融。在涉及具体作品时，一方面要在区分的体系内发现它的独特性，另一方面要在不同的区分体系间寻找它的共通性。例如对宗璞小说《野葫芦引》的论述就不仅关注了作家对抗战这一历史事件呈现的方式，而且将宗璞创作的女性情怀与历史叙事品格作为贯穿于文人写史这一融合正史/事件和人物/经历的史传传统流向的阐释和辨析中。

其次是对古代小说、现代小说、当代小说的处理。因为在“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这个题目里还间隔着巨大的历史时空线索，也就是说在研究这个题目的同时还要面对当代长篇小说之前的古代小说、现代小说，要面对“史传传统”对它们的影响，即通观意识的强调。因此，古代小说、现代小说的阅读积累和思考程度也是面临的难题。然而，文学传统研究的当代价值也即在于此，无论是文学传统

对当下文学的深入影响所造就的文学审美表现之深邃与作家主体情怀之开阔，还是以实证式的方式取径于具体的当代长篇小说文体实践所暗合的史传精神之厚重，这些都表明了对某一重要文学传统进行逆向回溯研究时的理论张力以及向文学资源寻求历史对话的可能性。

再次是对当代长篇小说不同发展时期的处理。如何将“十七年时期”、80年代、90年代、21世纪以来这些不同时期的当代长篇小说之历史叙述与文体实践缝合在一个相对统一的结构框架中，这是在思考研究整体结构方面所遇到的问题。因为对每个时期的论述都存在巨大的探讨价值和研究空间。但是如果将它们都放在当代长篇小说不同时期发展过程中，以具体作品中“史传传统”的转化、变异为研究参照系，那么每个时期的凸显和不同时期的弥合就变得困难了。因此，在具体研究思路的考量上则是以问题的方式来结构不同的当代长篇小说发展时期。比如“十七年时期”和90年代的当代长篇小说都体现了史传兼合与史传分离的特征，但是它们又十分不同，所以并没有将它们都放在一章内，而是分别论述，即本书下编中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六章、第七章，由此，对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研究所获得的就不只是单纯的历史线索，更为重要的是在历史线索的内在逻辑下，转化和变异问题的突出，因之也就更能在历史线索的缝隙处发现当代长篇小说的鲜活气息和文体发展的曲折轨迹。

最后是对研究中涉及具体作品的阐释。在同一时段，选择这部作品而不选择那部作品，这是研究者的个人眼光，同时带有强烈的个人局限，当然更无法避免阅读个体经验的介入和个人趣味的作用。尽管选择依然是在既定的、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成规中的产物，但是在具体的作品分析和研究中仍力图实现些微的个人创造。毕竟研究的主体性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这又存在一个度的问题。如何避免过度阐释是在研究具体作品、作家时的自我警惕。例如在下编第八、第九、第十章里，试图以提出问题的方式来充实研究论题，即史传传统的新与旧，并将不同时期当代长篇小说中所出现的自传式写作、未完成作品、类型化写作等都放在这三章的研究中，最大限度地呈现当代长篇小说在面临文学传统与文学现实时的自我调整与偏离变异，而传统的潜行与逃逸也正是在如此的文本细读与时空混杂中渗透出更为复杂与深层的审美态势。由此，文学传统的影响实际上也并不一定非新即旧，它是一个看不见的“幽灵”。

如果说在“史传传统与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关联研究中有什么特色与创新,那么具体说来应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对史传传统在中国小说中不同流向的区分。即趋向正史/事件的史传传统;趋向人物/经历的史传传统;趋向世情/虚构的史传传统。通过对这三种不同流向的史传传统的梳理,把握中国小说对史传传统的吸收特质。笔者认为它是作为一种底色和根基来吸收的。同时,研究中又没有将三种流向的区分单一化、绝对化,还注重辨析在这三种不同流向中存在着的相互交叉和流动。可以说,正是在事件、经历、虚构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小说尤其是长篇章回小说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貌与诗学内涵,这也是中国小说在史传传统的不同流向中所生发出的独特文学魅力。

第二,对史传含有的“史”和“传”内在分离性的研究。这个问题源于对“十七年时期”经典性长篇小说结构特点的关注,比如对孙犁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所表现出文体裂隙的分析,继而联系孙犁的整个创作过程,通过文体的变化发现其文体的内在分裂。这种分裂,一方面是由于史传传统中趋向写史与趋向写世情的史与传的内在背离;另一方面是植根于孙犁创作中所蕴含的两种历史观念的冲突。而通过这样的具体作品,深入作家的创作,探讨历史观念审美表达的可能性与复杂性,以此来阐明传统的依附性。这种强大的甚至已经浑然不可见的“依附性”,一方面构成了中国小说至今没有中断的文化血统和美学特质;另一方面,史与传的内在背离也使史传传统本身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分裂。这就是笔者要探讨的史传分离与史传兼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在“十七年时期”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存在。

第三,趋向事件、人物、虚构的史传传统之不同流向都被当代长篇小说作为传统因子而吸收,但并不能在一一对应的层面发现它们的存在,而只能是在文学与历史的裂隙中寻觅传统的轨迹,它们是值得细化的研究现象。因而,关联具体作品的研究思路就需要研究主体创造性的发现。笔者在研究中比较倾向于注意那些带有转折意味的变化。比如下编第四章对姚雪垠《李自成》的研究实际上来自如下研究动力,即对“新历史小说”这一理论命名的怀疑。尽管所谓的“新历史”之说法与西方历史编纂学中的“元历史”观念有相似之处,但是,在当时的创

作中这一名称或对历史叙述之新意的指涉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匮乏性。虽然对“新历史小说”的命名是其时的评论家介入问题的有效方式，但面对这样的命名，历史的“新”意并未有所革命，相反却陷入了乏味和溃败，因为文学在放逐了历史的尊严后留下的只是文学对历史想象力的苍白。

第四，对研究方法的思考。除了文学专业所必要的细读之外，在研究方法上试图做一些跨学科研究的尝试，因为该论题本身就涵盖了跨历史与文学的因素，而在研究中有意识尝试这样的跨学科意识即是论者研究主体性的一种自我拓展。如下编第六章即通过“小说与口述史”方法的结合，探讨当代长篇小说研究的历史意识问题。但并不是凭空引入口述史这一研究路径，而是因为当代长篇小说中尤其是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具有声音本体意味与明显采用口述结构的小说文本，而“声口”也是中国古典小说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因而面对《檀香刑》《花腔》《妇女闲聊录》《上海魔术师》这样的小说时，研究者应该具备怎样的历史意识或者应当对以往研究的历史意识有怎样的认识和反思，就有了值得探讨的意义。

还必须表明的是所谓特色与创新仅仅是个人之见，它仍然是要建立在对以往研究文献和既有研究成果的深入理解和研读之上。而最为重要的是当代作家对历史书写的持续探索给了笔者很大的研究空间和思考范围，如果不能在这样数量繁多、形态各异的创作事实面前尝试一些个人化的努力，那么笔者就无法面对研究对象的高度。

二 研究现状

具体到小说研究领域，涉及史传传统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史传文学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是郭丹的专著《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画卷》。该书分为本体论、流变论。在上、下两编中，作者全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史传文学。上编从文化背景、生成机制、本体意识、形式、文学性的历史、史学中的美学、横向研究方面，阐明了史传文学的立论问题。下编则以具体作品，勾勒了史传文学的发生、发展、成熟、典范、转折、回落。尤其要提出的是作者对“史传文

学”与“小说”间存在复杂关系的探寻、辨析有很多自己的创见，比如论者谈道：“由于形成了以形象和情节解释历史的传统，史传文学作者在记叙人物和事件时总是避免平板地介绍，而是采用故事化的手法叙述，这就使作品中人物常常具备鲜明的性格。茅盾说过：中国文学人物形象塑造的民族形式的一个特点，‘就是使得人物通过一连串的故事，从而表现人物的性格。’历史叙述的故事化、情节化，加上鲜明的人物形象，史传文学便具有很强的小说成分与小说模式，所以说，史传文学更应该是中国小说的直接源头。”^①这样的论证是很有历史感的。稍有遗憾的是，与上编的理论梳理相比，下编的作品论述、源流钩沉则略显平淡、新意不足。

其二，对小说与史传传统关系的研究。较早提出“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影响的学者是陈平原先生。他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一书的下编中尝试将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运用到对晚清至五四时期小说的研究中去，也提出了“传统的创造性转化”^②观点，并将其实际性地概括为两大传统，即“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又言：“笑话、轶闻、问答、游记、日记和书信的文体内涵都比较确定，‘史传’和‘诗骚’可就不那么好界定和把握了。说它们是一种文体，那是千年以前的古事了。至于‘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面对的，可能是编年史、纪传、纪事本末等多种历史编纂形式和古风、乐府、律诗、词、曲等多种诗歌体裁。不过我们选择作为历史散文总称的‘史传’与《诗经》、《离骚》开创的抒情诗传统——‘诗骚’，原因是

^① 郭丹：《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画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页。

^② 陈平原先生“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观点见《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下编“传统文学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该书第五章《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提出了这一观点涵盖的不同层面问题，包括接受新知与转化传统并重、产生误解的原因、古典文学而不是古代小说、对“叔侄继承”理论的修正与补充、小说从文学结构的边缘向中心移动、诗人及文章家作小说、小说概念的模糊、转化而不只是接受、转化三型以及两种移位的合力。他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新小说家’和五四作家接受的不仅仅是中国古典小说，而是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这就更容易造成‘新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没什么差别而五四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没什么联系这一错觉。单单从小说史这条线抓住《儒林外史》跟《官场现形记》的联系或《狂人日记》跟《水浒传》的区别，当然无法把握这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及其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转变中的作用。只有把本世纪初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放在整个文学变迁的大背景下考察，才能纠正这一并不轻微的‘错觉’。”参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5—167页。

影响中国小说形式发展的决不是某一具体的史书文体或诗歌体裁，而是作为整体的历史编纂形式与抒情诗传统。小说初级阶段的借鉴史书与诗歌，也许可以作为不同文体的互相渗透看待；可千年以下，‘史传’与‘诗骚’的影响于中国小说，已主要体现在审美趣味等内在的倾向上，而不一定是可直接对应的表面的形式特征。考虑到‘史传’、‘诗骚’对中国人审美趣味的塑造以及对中国叙事文学史发展的制约，似乎不应作文体看；但考虑到引‘史传’、‘诗骚’入小说的倾向古已有之，追根溯源又不能不从文体入手”^①，并进一步阐明：“我论及史传传统与诗骚传统的制约，使中国诗人倾向于把‘叙事’转化为‘纪事’和‘感事’，最能代表这一倾向的即是‘诗史’之说。‘纪事’追求历史感和真实性，‘感事’追求形式感和抒情性。写得好可能诗中有史或史中有诗；不好则可能有诗无史或有史无诗——这两者都同样限制叙事诗的进一步发展。”^②可以说，陈平原先生的尝试与概括是极为精准的，都涉及研究对象根部的问题。尽管论者本人也意识到叙事模式研究的单一与某些偏颇、不当，但是，将其放在已有的研究文献中考量该书的研究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开创性的研究，已然奠定了“史传传统”与小说关系研究的起点和理论高度。而论者在1998年初版、2004年9月再版的专著《中国散文小说史》中亦进行了小说与散文的跨文体研究，言及“中国古代没有留下篇幅巨大、叙事曲折的史诗，在很长时间里，‘叙事’几乎成了史书的专利，以至千古文人谈小说，没有不宗《史记》的……决定了‘史传’传统……在中国小说艺术发展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③，而且“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正如鲁迅所说的‘有两种特别的现象’，即‘反复’与‘臃杂’。为了使得这种变迁的轨迹及其复杂性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这里尝试突破线性时间的限制，不完全依年代先后叙述”^④。这样的研究思路与尝试，不啻深化了对史传精神与小说笔法关系的延续性研究。需要特别提示的是，就结构该书的

①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300—323页。

③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④ 同上书，第14页。

叙述策略，论者尤其强调了“穿越文类边界”^①的意图背后所隐含的恰是不同文类的互相影响以及它们对其文学传统的承续和发展。他指出：“在谈论散文发展时，关注小说的刺激；而描述小说变迁时，则着眼于散文的启迪。这种叙述策略，最大的陷阱是穿凿附会。需要一个过渡形态，使得穿越边界的行为，不至于显得过分鲁莽。在这方面，作为中介的‘笔记’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在我看来，正是借助这座桥梁，超越小说与散文的‘边界’，才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笔记’之庞杂，使得其几乎无所不包。若作为独立的文类考察，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但任何文类都可自由出入，这一开放的空间促成文学类型的杂交以及变异。对于散文与小说来说，借由笔记进行对话，更是再适合不过的了——这是一个双方都可介入、都与之渊源甚深的‘中间地带’。”^②又谓：“从晚清开始的文学革命，使得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与小说，与唐宋明清同类作品差异甚大，以至研究者大都倾向于‘分而治之’。本书不采取这一策略，而是为贯通古今。这里涉及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进程的理解，即强调在‘从古典到现代’的文学变革中，传统依旧以某种形式发挥积极作用。不管是借‘活着的传统’沟通古今，还是以‘传统的转化’体现发展，关于中国散文与中国小说的历史叙述，都不应该终止于晚清。”^③这样的见识与眼光，无疑为对此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提示出了更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的研究方向。

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方锡德先生于《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一书中较早开始了对现代小说文学性的历史化研究。在该书第三章“史传意识”中，作者论述了现代小说的史传传统，从小说与史传亲和的传统、史传小说因素的再发掘、“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实录写真的现实精神、美丑必露的审美原则、心存泾渭的春秋笔法等方面，将现代小说对史传传统的继承，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④。该书较有特点的论述是将古代小说的美学特征与现代小说的美学内涵较好地联系起来，但是通观全书，作者的研究思路还是比较单一，大多遵循了同一个研究方

① 陈平原：《中国散文小说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② 同上书，第14—15页。

③ 同上书，第15页。

④ 参见方锡德《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学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6—210页。